

行动者网络中的协同创作：AI与创作者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中的角色实践研究

王天宇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9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0日

摘要

随着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与AIGC技术对内容生产流程的深度嵌入，博物馆短视频生产正经历从“人主导”的工具模式向“人机互动”的协同模式转变。在此背景下，传统“主体-客体”的研究框架难以有效解释AI与人类创作者之间动态、复杂的关系。研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馆藏光阴”系列AI文博短视频项目的深度分析，探讨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的行动者网络中，人类与非人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过程相互联结与博弈。研究发现，AI与人类创作者的角色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具体实践中通过互动被动态界定，并最终形成了“主-仆”、“师-徒”、“谈判-共生”等典型的协同关系模式。文章通过打破人机二元对立的视角，为理解智能时代的协同创作提供了关系性与过程性的新见解。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人机协同，博物馆短视频，AIGC，转译

Collaborative Creation in the Actor-Network: A Study on the Role Practices of AI and Creators in Museum Short Video Production

Tianyu W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6

文章引用：王天宇. 行动者网络中的协同创作：AI与创作者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中的角色实践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0): 63-70. DOI: 10.12677/jc.2026.1410261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useum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GC technologies into content production workflows, museum short video production is undergoing a shift from a “human-dominated” tool-based model toward a “human-AI interactive” collaborative model. In this context, the traditional “subject-object” research framework proves inadequate for explaining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AI and human creators. Adopting Actor-Network Theory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useum Collections through Time” series of AI-assisted cultural heritage short videos, investigating how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terconnect and negotiat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ithin the actor-network of museum short video produ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oles of AI and human creators are not predetermined but are dynamically defined through interaction in concrete practices, ultimately giving rise to typical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models such as “master-servant”, “teacher-apprentice”, and “negotiation-symbiosis”. By transcending the human-machine binary opposition, this study offers relational and processual new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collaborative cre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Actor-Network Theor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useum Short Video, AIG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在博物馆数字化转型与“短视频+”传播的双重驱动下,AIGC技术已从辅助工具深度嵌入内容生产的核心环节,推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范式发生显著变迁。截至2025年9月,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达7046家,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¹。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与数字化投入的加大,并不必然带来传播效能与文化品质的同步提升——当AI技术以轻量化、低成本的优势涌入文博领域,史实不讹、文脉不失便成为必须守住的底线。在人机协同创作的过程中,AI不再是被动的指令执行者,而是广泛参与内容创意、视觉生成与效果优化的行动者,这使得传统基于主客体二元论的研究框架难以有效诠释人机之间动态、复杂的建构性关系。现有研究大多陷入一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类陷阱,即试图为AI预设一个固定的角色标签——“工具”、“伙伴”或“创作者”。这种二元或三元对立的视角,忽略了在具体的、动态的创作实践中,AI与创作者的角色是流动的、相互构建的且高度情境化的。

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的行动者网络中,人类与非人行动者(如AIGC工具、平台算法、机构制度等)如何通过“转译”过程相互联结、界定角色,并形成稳定的协同实践模式?为深入考察这一协作过程,本文选取北京日报社“光影记忆”栏目下属的“馆藏光阴”系列AI文博短视频作为关键案例。该系列作品融合AI生成视频(如老照片动态化、文生图-图生视频、文物AI形象设计)与人物访谈视频,总长约3~4分钟。自2025年6月至2026年1月,前五期陆续在北京日报客户端、视频号、百家号、微博等全网平台上线,累计播放量破百万,相关话题上榜微博热搜²。该系列生动体现了

¹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达7046家_新闻频道_央视网(cctv.com)。

²北京印刷学院与北京日报社携手打造AI文博新范式,《馆藏光阴》全网播放破百万。

人类叙事与 AI 视觉化能力的交织,为本研究观察行动者网络的构建与角色协商机制提供了适切的经验现场。

2. 从 PGC 到人机协同：媒介内容生产模式的范式演进

在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生产高度依赖专业机构、昂贵设备和特定技能,形成了以专业媒体人士为主导的专业内容生产(PGC)模式。这种模式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权力高度集中,受众的角色相对被动。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降低了内容创作的门槛,“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概念应运而生。UGC 的兴起标志着媒介权力的重要下放,用户不再仅仅是内容的消费者,更成为了生产者。学者们用不同的理论来描绘这一转变。阿尔文·托夫勒早在 1980 年提出的“产消者”概念,在数字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印证——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日益模糊,用户的参与度极大地改变了内容生态[1]。Axel Bruns 则提出了“产用”这一更为激进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种协作式、迭代式、用户主导的内容生产模式。在新闻领域,这一趋势体现为“参与式新闻”和“开放新闻”的兴起,专业记者与普通用户共同生产新闻内容。

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突破,再次重塑了内容生产的图景。如果说 UGC 打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壁垒,那么 AI 的介入则是在生产者内部引入了一个强大的“非人”行动者。内容生产的要素、流程和效率都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机协同内容生产浮出水面。关于人机关系的研究,学者彭兰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的前景,并提出了三种新的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与人机共生[2]。这几种关于人机关系的探索将智能内容生产、分发以及人机对话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许静等人看来,最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关系将从单向的线性关系转向复杂紧密的人机耦合,最终共同进行劳动生产[3]。关于人机协同,有学者提出了替代式、补充式和共生式三种协同方式[4]。其中,共生理念原本是生物学的概念,1879 年,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提出,随后多位学者对其进行完善。随着理论的发展,对共生概念的理解也变得多元,共生理念可理解为事物或单元间形成的一种和谐统一以及相互促进的关系[5],也可概括为不同事物现象间交互作用形成新的稳态,创生新事物的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进劳动所产生的协同,更多的是共生式的协同。

结合布鲁诺·拉图尔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要从行动者的行动中去洞察社会的运转过程,行动者不仅指行为者,还包括观念、技术[6]。本研究主张将人机协作的模式转而关注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AI 与人类创作者的角色如何被动态地协商与界定。

3. 行动者网络的构建与异质行动者的征召

3.1. 理论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本研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也称为异质建构论,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卡龙(Michel Callon)和劳恩(John Law)等学者为核心的“巴黎学派”所提出的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最早见于拉图尔的《行为中的科学》[7]。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概念,即“行动者”(Actor)、转译(Translation)和“网络”(Network),核心思想是:现有的每一种社会“事实”(Reality)都是一系列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

该理论认为任何可以制造差别进而改变事物状态的元素(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都处在一个共同建构的关系网络(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之中[8]。网络中的行动者是异质性的,人类行动者(Humans)和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s)两者处于对称性的地位。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所有行动者都被看作具有能动性,同时也是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存在。行动者基于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的语言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进行转述(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译”),并且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在

转译这一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得以汇聚,形成联结(Associations)。当行动者之间通过“联结”趋向稳定时,最终便形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9]。

除此之外,对本研究而言,合理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还具有以下的优势:首先是对“事件动态”的强调。行动者网络理论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分析或简单地对事件进行事后分析,而是关注于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的具体行为实践,描述其中的动态关系。其次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过程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全局性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要求研究者从宏观的事件出发,进入到现实场域中进行实地观察,探寻事件中行动者的微观状态和动态过程,通过在研究中对性质不同的微观对象进行关联和整合,最后系统性地对事件整体进行分析。

3.2. 问题呈现:核心困境与强制性通道点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是一个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发生的过程,指的是通过对现实条件的组织将分散的小问题转化为一个总问题,并确立一个所有行动者都必须通过的必经之点。该环节所包含的核心理论逻辑在于谁界定了问题,谁就有机会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10]。问题的界定不仅决定了何种路径被视为可行,也在事实上限定了哪些行动者能够参与问题的解决。“馆藏光阴”项目的网络构建,源于一个核心的问题呈现:在数字化传播语境下,如何有效“活化”厚重的馆藏资源,使其在赢得公众关注的同时不失文化内核的严肃性?

在 AI 生成技术持续介入文化报道生产流程的背景下,人类行动者的职能边界也在逐渐变得模糊。相较于以明确岗位分工为基础的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当前的协作实践在高度不确定的内容制作中逐步展开。这种变化与学界关于液态新闻业的讨论形成呼应。该概念源于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11],被马克·德乌兹引入新闻研究领域后用以描述在高度媒介化与技术加速的环境中,新闻生产中的职业角色与责任分配趋于流动化,不再完全依附于既定的制度与岗位安排[12]。这一现象也验证传统模式中,编导、拍摄者等人类行动者的目标相对单一,即准确地传递知识,其角色分化基于专业分工。而在融入 AIGC 的协同模式下,人类行动者的目标发生了深刻的转译:媒体机构的使命被转译为“打造适应新媒体的文化产品”的流量目标;博物馆的学术诉求被转译为“确保 AI 生成内容历史准确性”的审核目标;短视频编导则跃升为关键的“转译枢纽”,其职责从单纯的剪辑扩增至在文化权威、AI 特性与平台算法之间进行双向转译与协商。

这一系列目标共同汇聚于一个“强制性通道点”:所有行动者必须围绕“生产既具传播效能又保文化品质的 AI 文博短视频”这一核心任务展开协作。

3.3. 异质行动者的征召与网络联结

在“馆藏光阴”项目中,人类行动者内部首先形成了目标与角色的分化。北京日报社光影记忆工作室与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组成校媒双导师团队,分别从专业和业界视角为学生提供指导。至今已有 27 名本科生、研究生作为短视频创意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剪辑及 AIGC 内容创制等内容主创全程参与。2025 年 6 月,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日报社产学研合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约定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讲求实效、共谋发展”的原则,共同培养复合型传媒人才。

与此同时,非人行动者展现出强大的能动性,深度参与了网络的联结。AI 技术群(如文生视频模型、老照片动态化工具)以其特定的“物质性”——生成效率高但可控性弱——主动“提议”了新的工作流程与视觉美学。在《绝美宋版书如何诞生?》一期中, AI 技术被用于复刻宋代印刷作坊的完整工艺流程,让观众直观看到宋版书“诞生”的全过程。馆藏资源(如老照片的清晰度、文物的形态)作为关键的非人行动者,其物质属性构成了创作的客观约束与起点。而短视频平台的算法规则与界面设计,则作为一种强

制性的“技术脚本”，规定了内容的形式与成功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AI 工具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技术群。项目团队将经专家审定的脚本分镜转化为 AI 可识别的、更加细致化、场景化的提示词，进行背景、场景与装饰元素的批量生成与风格调优。在呈现古代印刷、海关通关等历史场景时，AI 能够快速产出写实风、手绘风等多版视觉方案。此外，视频运用 AI 语音合成工具生成旁白与文物拟人台词，支持调整语速、语调与情感色彩，实现多角色声音的快速匹配。

整个网络的稳定依赖于所有行动者围绕“强制性通道点”所进行的持续协商与相互适应。人类创作者借助 AI 追求视觉创新与传播效能，而 AI 的输出又必须接受基于历史真实的筛选；博物馆所提供的权威内容需经由创作者转译以契合平台的算法偏好；而每一期成型的 3~4 分钟短视频，正是这一异质网络成功通过关口的物质化证明。

4. 转译与博弈：人机角色的动态实践与协商

4.1. 问题呈现：人类如何“转译”创作任务

既有研究显示，在传统文化报道的生产模式中，转译活动往往聚焦于少数关键节点[13]。例如，记者将现实事件的原始素材转化为符合新闻叙事逻辑的文本内容，编辑将主题要求转化为具体的修改意见，技术人员将创意构想转化为可落地的制作方案。这类转译通常以相对稳定的对象为依托，一旦转译完成流程便会顺畅进入下一环节。而 AI 生成技术的引入明显改变了这一相对稳定的状态，生成内容难以通过单次转化就实现从构想到成品的跨越。在“馆藏光阴”的创作实践中，转译过程首先体现为人类创作者将抽象的创作难题转化为 AI 可理解的任务指令。

以《京城最珠光宝气博物馆！这里藏着地球“写”给人类的三封信》一期为例，创作团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地质博物馆的矿石标本“开口说话”？这一抽象的叙事诉求被“转译”为一系列具体的 AI 提示词——水晶王被赋予“永恒”的主题、狗头金被赋予“热情”的主题、中华石鸟被赋予“生命”的主题，AI 据此生成三位“地球邮差”的拟人化形象。

这一转译过程并非单向的指令下达。AI 通过其生成结果，重新“定义”了人类的问题。当 AI 产出的视觉风格与人类预期产生偏差时，人类创作者被迫调整提示词策略，从而在反复的“提示 - 生成 - 修正”循环中，双方共同界定了最终的视觉方案。正如研究所指出的，AI 在人机协同过程中对人的指令进行再诠释，这种再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反向的转译[14]。

4.2. 利益赋予：角色期待的相互塑造

利益赋予是转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人类赋予 AI 效率提升和创意启发的期望；AI 则通过其能力边界和惊异效果，赋予人类“提示词优化师”、“内容过滤器”的新角色。

在“馆藏光阴”中，人类对 AI 的期待清晰而具体：快速生成历史场景复原画面、降低特效制作成本、提供多版本视觉方案以供选择。传统特效制作周期长、成本高，而 AI 能够在数天内完成从分镜到成片的转化，单集成本压缩至传统模式的十分之一以下。AI 满足了这一期待——项目内容产出周期从数周缩短至几天，能够以极低的投入实现系列化、持续性的内容产出。

与此同时，AI 通过其能力的局限性反向塑造了人类的角色。AI 在历史准确性上的不确定性，要求人类创作者承担起“审核者”角色。正如研究所揭示的，AI 大模型在事实核查与价值判断等方面难以胜任。主流 AI 工具在新闻引用中错误率高达 60%。因此，“馆藏光阴”项目形成了“创作者 - 媒体 - 文博专家”三级联动的质量把链条。创作团队借助 AI 工具完成版权核查与细节比对；媒体编辑把控价值导向、叙事尺度与语言规范；文博专家负责历史背景、文物信息与工艺细节的终审。AI 的“不可靠”恰恰赋予了

人类“把关人”角色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4.3. 动员与排除：行动者网络的重构

转译过程同时伴随着动员与排除——某些行动者被招募进网络，另一些则被边缘化或排除。

在“馆藏光阴”的协作网络中，AI 的介入显著改变了传统创作团队的人力配置。传统视频制作中不可或缺的“特效师”角色被部分取代——AI 承担了大量场景生成、画面渲染的工作。资深研究员的历史考据角色虽然未被完全排除，但其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从主导内容生产变为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事后审核与校正。这种角色重构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

与此同时，新的行动者被招募进网络。AI 提示词工程师成为一个关键的新角色——那些能够将文化意象精准“转译”为 AI 可识别指令的创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项目依托新闻传播学院的《全媒体创意与策划》《视听创意》《智能内容生产》等课程，系统培养了学生在这一新分工中的能力。人类创作者如何成为“代言人”，协调 AI 与其他人类行动者(如审核者、博物馆专家)的关系，成为决定网络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该案例所呈现出的融合不再只是渠道层面的连接，而更多体现为生产结构层面的整合：原本分散于平台、技术与组织之间的条件被转化为可以共同作用的生产要素，并为行动者网络的稳定运行提供结构支撑[15]。

5. 网络的稳定与模式：协同创作的关系形态

5.1. “主 - 仆”模式：AI 作为高效执行工具

在“馆藏光阴”项目的基础层面，AI 首先被定位为高效的执行工具。AI 语音合成工具生成旁白与文物拟人台词；AI 绘画与视频生成工具完成背景、场景与装饰元素的批量生成。在这些环节中，人类掌握绝对主导权，AI 严格按照人类指令执行任务，其角色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具”。

这种模式构成了人机协同的初级阶段，也是项目得以高效运转的技术基础。然而，“主 - 仆”模式并不能涵盖人机互动的全部面向。当 AI 的输出超出人类预期或生成内容需要人类进行甄别与选择时，关系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5.2. “师 - 徒”模式：AI 提供创意灵感

在更深层次的协作中，AI 扮演了“创意学徒”或“灵感提供者”的角色。AI 通过海量学习，能够快速产出多版视觉方案——写实风、手绘风等——为人类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备选方案。人类创作者则在这些方案中进行甄别、选择与深化。

以《探寻国门通关千年密码！长安街边为何“停泊”神秘舰艇》为例，AI 技术被用于呈现古代海关的通牒场景，与今日海关工作形成古今交错的画面对比。AI 生成的视觉方案并非直接可用，而是需要人类创作者从中选取最符合叙事意图的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与深化。这种“AI 提供选项、人类做出判断”的互动模式，体现了“师 - 徒”关系的典型特征——AI 像是一个勤奋的学徒，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灵感，而人类则是经验丰富的师傅，负责甄别、把关与升华。

5.3. “谈判 - 共生”模式：人机风格的深度融合

在“馆藏光阴”最具创造性的环节，人类与 AI 进入了“谈判 - 共生”的关系模式。AI 的“物质性”——其生成逻辑、风格偏好与能力边界——深度影响了最终的知识呈现形式。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相关内容中，项目借助 AI 技术融合馆藏甲骨文的视觉元素，生成“甲骨文碎片小人”，与馆藏解说员、小记者一同游览博物馆。这一创意并非完全出自人类想象，而是人类与 AI 反复

“谈判”的结果：人类提出“文物拟人化”的诉求，AI 以其独特的生成能力提供了“碎片小人”这一视觉方案，人类在此基础上调整叙事逻辑与情节设计，最终形成了“人机风格融合”的独特叙事。AI 拟人化台词与情节设计均经过文博专家严格审定，从源头杜绝虚构、戏说等违背史实的表达，确保创作在趣味性与严谨性之间取得平衡。

正如研究所揭示的，AIGC 技术的发展重塑了影像创作流程，对创作主体性、艺术表达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谈判-共生”模式中，人类与 AI 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指令与执行，而是双向的塑造与适应——人类的创意被 AI 的“物质性”所塑造，AI 的输出也被人类的价值观与专业判断所校准。

5.4. 协同关系模式的动态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模式并非固定不变或相互排斥。在同一项目的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人类与 AI 的关系可能在“主-仆”、“师-徒”、“谈判-共生”之间动态转换。在脚本撰写阶段，AI 可能扮演“创意学徒”的角色；在画面生成阶段，AI 可能退回到“执行工具”的位置；而在视觉方案的最终确定中，双方又可能进入“谈判-共生”的深度互动。

这种动态转换恰恰印证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洞见：行动者的角色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互动被不断协商与重新界定。博物馆短视频生产中的“协同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异质行动者持续“转译”、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动态过程。

6. 结论

本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馆藏光阴”系列 AI 文博短视频项目的考察，揭示了博物馆短视频生产中 AI 与人类创作者协同创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在博物馆短视频生产的行动者网络中，人类与非人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的转译链条相互联结。AI 与人类创作者的角色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具体实践中通过互动被动态界定——从“主-仆”到“师-徒”再到“谈判-共生”，三种协同关系模式反映了人机互动的不同深度与不同面向。

这一发现对理解智能时代的创意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上，本研究打破了“工具论”、“伙伴论”、“自主创作者论”的静态分类，提供了关系性与过程性的新视角——AI 的角色不是被预先定义的标签，而是在具体实践中通过持续的转译与协商被不断重构的。现实层面，“馆藏光阴”的实践表明，AI 赋能文博传播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让人类创意、AI 能力、制度目标与平台逻辑相互适配的稳定行动者网络。“人定内容、AI 做呈现”的分工原则，“创作者-媒体-文博专家”三级联动的审核机制，以及校媒协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共同构成了这一网络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更多类型的文博短视频项目，比较不同网络结构中人机协同模式的差异，也可关注 AI 技术持续进化对行动者网络带来的重构压力，探讨网络如何在不稳定中寻求新的平衡。在 AI 深度嵌入文化生产的时代，理解人机协同的动态逻辑，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更是文化传播实践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 [1] 昀熙. 阿尔文·托夫勒：给未来思想以全新的视角[J]. 现代企业文化(上旬), 2015(10): 68-69.
- [2] 彭兰. 人与机器，互为尺度[J]. 当代传播, 2023(1): 1.
- [3] 许静, 刘欣, 蒋雪颖. 新闻生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耦合的实践进路[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4(5): 114-122.
- [4] 蒋雪颖, 刘欣, 许静. 人机协同视角下生成式 AI 新闻的前沿应用与规制进路[J]. 新闻爱好者, 2023(11): 38-43.

-
- [5] 谢清果. 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8(4): 95-103.
- [6] 彭兰. 智能机器的多重媒介意涵及其影响[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77-89+172.
- [7]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吴莹, 卢雨霞, 陈家建, 等.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行动者网络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8(2): 218-234.
- [9] 王增鹏.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J]. 科学与社会, 2012, 2(4): 28-43.
- [10] Callon, M. (1984)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2, 196-233.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4x.1984.tb00113.x>
- [11] 夏鹏飞.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新媒介事件的建构研究: 以“淄博烧烤”事件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交通大学, 2024.
- [12] 廖诗怡.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 AI 生成技术对文化报道生产的影响研究——以 N 视频 AI 实验室合集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2026.
- [13] 张志安. 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6.
- [14] 彭兰. 新媒体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34(5): 36-47.
- [15] 刘千桂.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实践突破与创新发展[J]. 出版广角, 2025(2): 110-11.